

Alexander Casella  
[瑞士]亚历山大·卡塞拉 / 著  
吕丽丽 王华树 / 译

# 打破 常规

## Breaking the Rules

在联合国工作也可以很有趣，  
如果你做好准备去编造事实、撒个小谎、不按常理出牌，  
再装装糊涂，  
还可以做些好事。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CHINA

Alexander Casella  
[瑞士]亚历山大·卡塞拉 / 著  
吕丽丽 王华树 / 译

打破  
常规

Breaking the Rules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破常规 / (瑞士)卡塞拉(Casella, A.)著; 吕  
丽丽, 王华树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2. 12  
名书原文: Breaking the rules  
ISBN 978 - 7 - 5118 - 4428 - 6

I. ①打… II. ①卡…②吕…③王… III. ①回忆录  
—瑞士—现代 IV. ①I5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0789 号

© 法律出版社·中国

责任编辑/彭 雨

装帧设计/汪奇峰

出版/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固安华明印刷厂

编辑统筹/法律出版社上海出版中心  
经销/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陶 松

开本/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版本/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18.25 字数/267 千  
印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 - 63939792/9779

网址/www.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 - 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 - 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 - 85388843 重庆公司/023 - 65382816/2908

上海公司/021 - 62071010/1636 北京分公司/010 - 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 - 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4428 - 6

定价:39.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 作者介绍

亚历山大·卡塞拉,1936年出生于意大利的纳普勒斯,朋友们都叫他萨沙。母亲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世俗犹太家庭,是一位生物学家、古典钢琴家、舞蹈编导和心理学专家。父亲来自纳普勒斯的一个旧式家庭,是位出版人和藏书家。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相遇,当时他母亲从布拉格来到庞培城,为了在新近发现的古罗马剧场里演出的古典希腊舞蹈节目组织排练。

1943年,德国侵占意大利后,亚历山大和母亲以难民身份来到瑞士。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中,亚历山大在巴黎大学的文学院和理学院获得了文学硕士和哲学硕士学位,并在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从1965年到1975年,他作为演讲者、顾问和独立记者,往来于中国和越南两国之间。1975年,他参加了联合国难民署,并在那里服务了20年,足迹遍布万象、河内、日内瓦、贝鲁特和曼谷。亚历山大于1996年作为亚洲地区负责人从那里退休。

亚历山大·卡塞拉现居日内瓦,与美裔妻子和两只宠物猫生活在一起。目前,他是《亚洲时报在线》的专栏作者。

# 目 录

引言 .....	1
大马士革的骗局 .....	3
一步一个脚印 .....	6
初识亚洲 .....	11
1965年,西贡 .....	15
无敌记者 .....	20
1968年,新年 .....	23
联合国难民署顾问 .....	30
政治高于一切 .....	42
双边事件 .....	57
最后一次进攻,1975年3月 .....	59
联合国官僚,1975年5月 .....	62
对决在香港 .....	81
不堪承受的海市蜃楼 .....	86
出任驻河内的代表 .....	103
驯服这条小龙 .....	113
在美国的生活 .....	133
回归难民署 .....	139
中国的开放 .....	160
观光河内 .....	179
乘船出逃的民众和官僚主义者 .....	183

拉开去黎巴嫩的序幕 .....	190
贝鲁特,1984年 .....	193
另一个名字战争 .....	208
胡克管辖区内的枪战 .....	214
重返越南 .....	231
阿尔巴尼亚 .....	248
结束偷渡传奇 .....	260
另一个世界 .....	276

## 引 言

1982年2月,阿斯彭研究所邀请我参加该研究所专门为大企业的资深领导组织的研讨会。研讨会主题是“道德与价值”,目的是使大企业的领导意识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利润也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

在第三天会议快结束时,我竟然给自己赢得了一个“瑞士批评人”的绰号。如果说批评人是指那些不值得信赖的鼓吹者,尤其是那些自称目的纯粹或动机崇高的人,那么我的确是一个真正的批评人,而且理由充分。

在越战时期做了近十年的新闻记者后,我在1975年接受了来自联合国难民署高专萨德鲁丁·阿迦汗亲王的邀请,参加了这个组织。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做一个人道主义者,更别说是一个联合国的官僚。但是,我不能拒绝面前的这个挑战:当越南共产党和其苏联同盟,都视联合国为敌人的时候,游说河内共产主义政权的核心与联合国难民署进行一次对话,理论上来讲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它的魅力就在于此。

刚加入联合国难民署时,我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人道主义世界的人们都只是那些无私的人、善良的人,还有那些只关注减少人们痛苦的奉献者。很快,我就放弃了这种错误的想法。在其后的20年里,我在人道主义者行动的残酷的世界里,从河内到贝鲁特,从曼谷到香港,所遇到的人道主义者不仅包括自以为是的人、缺乏想象力的人,还有那些野心家们。为了他们所服务的慈善组织,这些人做了点好事,但是他们在幕后花费大量精力互相倾轧,为了出名和占有更多的公众钱财相互竞争。在我的印象中,最糟糕的人莫过于在所谓的人道主义拥护者中发现那些认为他们的使命只是说教而不是行动的人。虚荣、傲慢、自恋、侵犯人权是他们的家常便

饭,为了在竞争中表现得比其对手更为主动,他们时常毫不犹豫地编造谎言。

作为联合国难民署的成员,人们可以认为我和他们是同类人。的确,我似乎是,但有一点不同,我无意成为一名人道主义者。在这段经历中,我虽没有做善事的愿景与期待,却有信心不做有害之事。

一时间,运气、狡猾与务实加上一干观点相近的犬儒主义者们的支持,分担了我的痛苦,确保我得到了比曾预想的烦躁而更多的益处。

我不否认,当我的头像在香港的越南难民营中被烧毁时,这给了我某些满足感。我把这当做一种成就。我的罪行在于使潜在的越南偷渡者相信,在越南战争结束20年后,现在他们有资格合法地离开越南,而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偷渡。由此终结了越南难民以偷渡的方式逃离越南的历史。其实这也给在美国的难民支持者们一个解脱的理由。正是这些支持者怂恿那些在香港难民营中的越南船民烧毁我的头像。而这恰恰是他们能够给我的最高奖赏;我曾经全力反对那些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企图拖延人道主义危机结束的人们。

倘若在近二十年的人道主义行动前线的震荡中有什么可以总结的,那就是希望与担忧并存。怀有希望的是,虽然在国际机构中普遍存在平庸者掌控权利却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但我们仍可以做好事。但在危机出现时,当人道主义机构的官僚们不能如往日那样依赖惯常方式行为时,也没有可取代他们的机制,务实的人道主义批评人只能敢于打破规则,忽视僵化的道德教条,做正确的事,而不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存有担忧的是,在当今世界上,当官僚机构激增,官僚规则盛行时,那些干事的且有原则的批评人的声音渐渐消失,反而是众多的平庸之辈的吼声越来越大。



## 大马士革的骗局

“先生,我能提及阿富汗的事吗?”叙利亚外交部副部长,埃萨姆·阿尔·奈伯打断我,“在叙利亚没有阿富汗难民”,他以谨慎的语气低声地咆哮着,透露的愤怒比任何高声都有力量。阿尔·奈伯非常清楚他如此肯定的事情不是真的。在叙利亚有成百上千的阿富汗难民。他知道我了解这个事实,我也清楚他知道我知道,但这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日期,1984年12月2日。冷战如满弓之箭随时可以爆发,苏联入侵阿富汗,数以百万的阿富汗难民逃向邻国。叙利亚是苏联在中东地区主要的盟国,并且大马士革的统治者完全依靠苏联提供武器,叙利亚付不起反对莫斯科的高昂代价,已经表明立场:将在中东地区游荡的成千上万的阿富汗难民封锁在边境。这至少是官方政策。然而,实际上,叙利亚人已经对在其国土上出现成千上万的阿富汗难民的情况视而不见。苏联当然清楚这一切,但是只要这个情况没有公开,它也当做没看见。但是事件依然微妙,可以随时使叙利亚难堪。因此,并不奇怪我只提阿富汗一词就会使副外长愠怒。我不能让事情就此为止。

一周前,我头顶着“联合国难民署中东地区代表”的头衔抵达贝鲁特。这时,我已经参加联合国难民署约十年,这是我的第二个外派职务,而且极不轻松。除巴勒斯坦人另由联合国部门署负责外,我负责整个中东地区的难民。为了工作便利,我的驻地选在黎巴嫩,更准确地说是在穆斯林控制的西贝鲁特地区。黎巴嫩此时正陷入一场残酷的内战,巷战、绑架、汽车爆炸每天都在发生。所以,我不仅要留意难民来拜访我,还必须在西贝鲁特生存。

我的任务是在该地区访问每个国家,在贝鲁特待上一周后,我决定首先从叙利亚开始我的访问,并带上副官阿卜杜勒·毛拉·艾尔·索尔。凭借黎巴嫩名门望族的身份,索尔成为联合国难民署在贝鲁特的重要人物。他在那里服务了多年,了解整个中东的情况,并且因成绩斐然获得了大家的信任,不管是信仰还是政治倾向。

平常,访问取道贝鲁特至大马士革得花费两个小时,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在早晨五点前到达,在经过6个由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武装小组把守的关卡,我们在午前到达大马士革并直奔外交部。

在路上,索尔已经向我简要介绍了叙利亚的阿富汗难民。那里有数千难民,大多数已经找到工作并且做得很好。但问题是叙利亚的学校教育并非免费,这意味着大约六百个阿富汗儿童因其父母无法支付学费而不能受教育。现在,我的工作使这些孩子能够上学。“小心,”索尔提醒我,“只要提到阿富汗人,叙利亚人就非常紧张。”

的确,刚提到阿富汗难民,我就遭到了叙利亚副外长的白眼。一阵沉默后,我尽可能降低语调,并避开了他的冷眼。“阁下,我不认为我曾说过叙利亚有难民。”我能感觉到旁边的索尔有些疑惑。“那么你同意了,没有难民?”副外长问道。“当然,”我回答道,“对此我完全同意,没有难民。只有一些不明国籍的外国人无法送他们的小孩上学,因为付不起学费。所以我们想通过一些志愿者或是贵国的社会事务部门,向孩子们提供学费。”

阿尔·奈伯笑了起来:“只要他们不是阿富汗难民,你愿意做就可以。”当我们分别时,我感到他对这笔交易很得意。

那个下午,索尔与我一起讨论了我们在叙利亚的各种援助项目。其中一项每年130,000美元的预算,目的是向目前在叙利亚的132个厄立特里亚难民提供帮助。这正是我想要的那种项目,于是我们开始伪造。就现存的厄立特里亚难民的数量,我们增加了600人,相当于小学生的数量,并设定了每个学生每年300美元的学费标准,包括衣服、课本、食品等,总共280,000美元。骗局就这样被完成了。篡改后的项目不会逃过审计,但是账目会保留在贝鲁特。当时黎巴嫩的安全没有保障,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有联合国的监察人员敢来这个地方。按照常规,我应发一个详细的备忘录

给我的上级,解释为什么为了帮助阿富汗人,我们将厄立特里亚难民数量增加了,并向他请求许可这么做。但我知道,上级不会批准。难民署的那些官僚才不会冒着自己的仕途风险,去批准一个作假的程序呢!如果我发个备忘录,将导致总部的官僚们不断地开会讨论、拖延,而且很有可能将我的备忘录的内容泄露,而阿富汗难民则得不到援助。所以,如果我想帮助难民,说谎不是一个选择,而是责任。

当我完成起草项目时,我能感到索尔是赞成的。很明显,我不怕联合国的官僚,对我来说做正确的事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其实在这之前,我已有过切实的锻炼了。在河内那两年,一边与联合国的官僚较量,一边与狡猾的越南人打交道,我上了终身难忘的一课。在那里,我认识到为联合国工作也会很有趣,如果你愿意说谎、搅局、走捷径、不循规蹈矩,有时也能做些好事。

然而,1972年9月,也就是我进入大马士革的12年前,我在日内瓦路旁的咖啡馆品尝卡布奇诺时,根本不会预料到会有这么一翻经历。

## 一步一个脚印

我于1936年生于纳普勒斯。我父亲是一位意大利知名的出版商和藏书家。我母亲来自布拉格的犹太家庭，她靠自身努力成名于维也纳，起初是一位古典钢琴家，后来又成为一个舞蹈编导。父母告诉我，我母亲在游览庞培城时他们相遇了，并在1930年结婚。我父母并未离婚，但多年后他们分居了，父亲住在意大利的纳普勒斯，母亲与我于1943年搬到瑞士的日内瓦。我读完高中后，我母亲搬到巴黎。

独自在日内瓦这座色调灰暗却悠闲的城市，我考进了大学。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因为没有向上的志向和更好的选择，我就到日内瓦大学的国际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尽管父亲每个月只给我一小笔生活费，但已足够支持我的学业。要不是因为我在日内瓦大学的一个美国朋友——吉姆·贝克特，我是不会遇到齐亚·利兹维的。在1972年9月初一个悠闲的星期六下午，吉姆安排我与利兹维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吉姆只是知道他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见我。

“所以，你经历了整个越战。我想，你是亲美的？”利兹维言语中带着故意屈尊的语气与含蓄的批评。

很明显，从他们狭隘的种族视角来看，我只是一个经历过越战的西方记者。利兹维是一个高个子、身材细长且皮肤黝黑的巴基斯坦人，留着优雅的胡须，具有穿射力的眼神和鲁道夫·瓦伦蒂诺<sup>①</sup>式的阴沉而好看的面

---

<sup>①</sup> 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1895年5月6日~1926年8月23日)，美国著名男演员，生于意大利Castellana，1926年因心脏瓣膜炎在纽约去世。

容。和其他记者不同的是，他用语言争辩，而不是用那些闲聊的话语向他的对话者倾泻，说起话来简短但带着机敏，就像佛罗伦萨人拔出短剑时那样。

我犹豫是否回应他的讥讽，但还是决定不放过他，假装超脱地回答：“实际上我与河内当局以及越南南方解放阵线的接触远远超过与美国人的接触。”

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而且已经离他想要的话题很远了。所以他就说有事要离开，同时说了句：“我以后再约你。”而我认为他说以后再约我，只是离开时候的礼貌而已。但我错了。

5个月过去了，我早把利兹维抛在了脑后。1973年2月初，电话响了，是利兹维。他说：“我想见你，有关越南的事。”第二天我去了他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办公室。

利兹维的办公室很小，简洁的摆设，没有特色，金属办公桌、书架、矮桌和两把扶手椅。当我被秘书带进办公室的时候，利兹维让我坐在其中一张椅子上，他自己坐在另外一把上。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有两个利兹维。一个是我在路边的咖啡馆里遇见的：他穿着便裤，深蓝色的保罗T恤衫，米黄色V字领背心，当时他正全神贯注地品尝卡布奇诺，并欢快地衔着一支大号古巴雪茄。但是，我眼前的这个家伙像是一条盘卷着的眼镜蛇，穿着一件带有白色条纹的深灰色西装，凸显了他的身高，并配有白色的衬衫和带有大圆点的领带。我心想，这不是普通的联合国官僚或能言善辩的印度教徒。他是个有主见而不容易被人左右的人。要是在古代，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征服者，率领军队驰骋在宽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坦率地讲，我承认他是我遇到的为数不多那种人之一，一出现就能令人紧张不安。接下来半小时，在态度和蔼但又云遮雾绕的对话中，我能看得出来他在尽力地揣度我。为什么我对越南感兴趣？我是如何在河内与越共接上头的？我是否相信了两周前，也就是在1973年1月27日，大张旗鼓地签订的巴黎和约（又称巴黎协定），能够取得停战的效果？如果这是一个测试，那么我通过了。随后他说：“跟我来，我将把你介绍给萨德鲁丁亲王。”

萨德鲁丁·阿迦汗<sup>①</sup>是老阿迦汗和他的法裔第三任夫人安德莉亚·卡伦<sup>②</sup>所生的儿子。老阿迦汗是3000万什叶派伊斯兰教信徒首领,这些伊斯兰人是伊斯梅尔人。他的同父异母的大哥——阿里汗(Ali Khan),是一个备受瞩目的人物,除与丽塔·海华斯婚姻外,还有过几次婚姻,曾在法国外籍兵团服役,是巴基斯坦驻联合国代表,他于1960年5月清早,在巴黎的布洛涅森林公园驾驶他的蓝旗亚撞到树上而死。通常,王位应当传给萨德鲁丁,但是老阿迦汗决定越过萨德鲁丁,指定阿里汗的儿子、萨德鲁丁的侄子——卡里姆(Karim),作为他的继承人。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传位的决定使萨德鲁丁失望,而萨德鲁丁原本就是一个非常独立自主的人。21岁从哈佛毕业后,他选择了从事公共服务领域,为联合国执行各种项目,并在1966年,也就是他33岁的时候,被选任为联合国难民署的高级专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一犹豫并不支持他进入联合国的却是美国政府。在公共领域服务的无可挑剔的记录,美式教育和涵盖美国政治体制的丰富的人脉资源,都不足以使他得到美国国务院的青睐。实际上,他的背景对他不利:他太有钱,太好看,太优雅,太有教养。但是,美国国务院最终发现阻止他当选需要花费太多努力,无奈,就接受了他。

我惊奇地发现萨德鲁丁和利维兹同样形象很好。他具有使人放松的天赋和抓住本质的能力,工作中通过这些能力找出基本要点。我们用法语交谈有关越南的情况,萨德鲁丁似乎对我的观察力很满意。同时,使我惊奇的是,在其他场合甚至在沉默的时候都具有压迫力的利维兹,此时虽然也在场,却似乎消失了。

我想,他们之间存在类似路易十三和黎塞留那种复杂的关系,两个人都是极其聪明的,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就是主人需要仆人,仆人也需要主人使唤他们。这次见面非常成功,因为当回到办公室时,利兹维提出聘请我

---

<sup>①</sup> 萨德鲁丁·阿迦汗(Sadrudin Aga Khan)(1933年~),自1965年起至1977年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

<sup>②</sup> 安德莉亚·约瑟芬·卡伦(Andrée Joséphine Carron)(1898~1976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宗教政治领袖阿迦汗三世的第三任妻子。

做亚洲事务特别顾问。我将每个月收到 200 美元和一定金额的出差经费，我的任务将是说服河内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与联合国难民署之间建立对话关系，其目的是在越南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为平民设立一个援助项目。

联合国难民署的正式任务是向难民提供援助，难民的定义是为逃离迫害而离开其祖国的人们。基于这一点，联合国难民署没有理由涉入越南内战，在那里人口迁移是国内迁徙。但是在 1963 年，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斡旋决议并规定若有必要，联合国难民署可以向国内迁徙人群提供援助。该决议为联合国难民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远景，并为其涉入越南提供了理由，但条件是必须由越南内战的一方或双方提出要求。西贡政府熟知国际体系的运作，并且懂得如何抓住这个机会获得更多资助，但是这不是萨德鲁丁所希望的。他希望提出援助的要求从所有竞争的越南各方提出，而我的工作是为让共产党一方这样做。

理论上，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一方面，河内不是联合国成员，而越南共产党认为联合国是美国的工具。另一方面，联合国难民署是联合国这许多年战争中唯一没有向河内政府提供援助的组织。尽管美国一直怂恿难民署支持西贡，萨德鲁丁一直坚持他的目标是持久性地解决越南国内人口迁移的问题，只要战争继续，从他这里获得的资金将被滥用，因此他一直回避越南的问题。

随着巴黎和约的签署，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表面上，越南已经和平，永久解决人口迁徙的问题现在可以提上议程。另外，巴黎和约已经承认事实上在越南南方存在两个政权，西贡政府和解放阵线。因此，越南有三个政治实体：河内、西贡和解放阵线。

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sup>①</sup>(Kurt Waldheim)也想过问，要求联合国各组织机构向越南全境提供援助。这里的关键是“全境”一词在越南南方既包括西贡政府控制的地区，也包括南方解放阵线控制的地区。

---

<sup>①</sup>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1918~2007年)，自1972年至1981年任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

作为经常活跃在第三世界的联合国组织机构的领导,萨德鲁丁对因越南战争在国际社会产生的两个阵营的分化现象非常反感。在战争期间,他一直尽力避开越南,但是现在,至少在理论上,战争已经结束,他知道很快就会收到来自西贡政府的援助请求,但是这将使他只能帮助一方,这是他无法接受的,他全力维护的是程序正当——这关乎形象的问题。联合国难民署必须出现在越南全境并向各方提供援助,为了做到这一点,联合国难民署在提供援助的时候必须公平对待各方。也就是说,不仅援助西贡政府,还包括河内以及解放阵线。对于萨德鲁丁来说,问题在于联合国难民署不能主动发起援助,只能回应援助请求。西贡政府深谙此道,并且取得效果。很明显,越南共产党很少获得过国际援助,因而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萨德鲁丁需要的是来自各方的请求:西贡政权是他能沟通的,但与河内和解放阵线则不行,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很难说,我与利兹维的相识仅仅是机缘巧合,加入这个团队,我没有做什么努力,只不过是相比较而已。



## 初识亚洲

1956年,我正在日内瓦大学读二年级。暑假在即,20岁的我尚无世故,对于该如何安排时间,我有些不知所措。此时在巴黎的母亲来信了,她最近的爱好就是罗夏—墨迹测验,<sup>①</sup>她一定因此而得名,因为她的朋友们曾使她的作品引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席郭沫若的注意。郭沫若的求知欲很强,于是邀请我母亲去中国参加北京大学的一个为期两周的罗夏测验讲座,并欢迎我也随行。

当时,我知道的国家里,没有几个比中国了解得更少的。在我模糊的印象里,国际社会上大多数强国都不认可这个国家。但这只是一部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当我即将随访中国的事情确定后,我感到我处在了一个颇为尴尬的境地。我的瑞士同学对我的旅行无动于衷,而那些曾经以朋友相待的美国同学则不同,他们大多数人开始不再与我讲话,而且尽量躲着我,好像我是传染病携带者。我一直对为什么中国在美国人中会引起这样的情感感到不解,直到我到《时代周刊》与《读者文摘》工作后才明白。很明确地讲,我的解释是来自美国人的恐惧:中国不只是一个脏乱的国家,在比利时传教士雷振远神父<sup>②</sup>的描述下,中国是邪恶的化身。

就这样,在事先被警告等待我们的全是危险后,我与母亲从马赛出发,经过30天的海上航行到香港,转陆路北 upper 于1956年9月1日黄昏,抵达

---

<sup>①</sup> 罗夏—墨迹测验是由瑞士精神科医生、精神病学家罗夏(Hermann Rorschach)创立,国外有时称罗夏墨迹(Inkblot)测验,或罗夏技术,或简称罗夏。

<sup>②</sup> 雷震远(Raymond J. de Jaeger)(1905~1980年),天主教神父。1930年来到中国,在河北安国教区任神父。